

东坡知登州故事⑧

苏轼书刻《楞伽经》

吴忠波

元丰八年(1085)开年后,苏轼的境遇,渐渐透进天光。自二月至九月,他寓居南都,途经扬州,落脚常州,奔赴登州,以卓绝才思,将佛经、书法、金石刊刻熔为一体,倾力书刻《楞伽经》。

宋苏刻本《楞伽经》既牵着与恩公张方平远超“忘年交”的生死情分,又“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写刻本之一,具有重要的历史、艺术和学术价值”。

一、南都授经

张方平(1007-1091),字安道,号乐全居士,应天府宋城(今河南商丘)人,北宋参知政事,谥文定。苏轼与他的关系,亲如骨肉。

嘉祐元年(1056),苏洵带着苏轼、苏辙兄弟出蜀,先到成都。张方平慧眼识英“大小苏”,直接写信推荐给欧阳修,还资助盘缠,让苏家父子顺顺当当进京。

第二年,苏轼、苏辙同榜中进士,后人称“千年第一榜”。苏轼在《乐全先生文集序》记载:“轼年二十,以诸生见公成都,公一见待以国士。”初出茅庐,得前辈这样礼遇,苏轼铭记在心。

元丰二年(1079),苏轼“乌台诗案”遭陷,满朝没几人替他说话。张方平已退休多年,住在南都,竟写了几千字的奏章,说苏轼“性资忠直,才识过人”,又引祁奚自比:“窃慕祁奚虽老,犹不忘公室”,情愿僭越上言,自干斧钺。”家人怕他惹祸,哭着拦也拦不住。南都官署不敢接这奏章,他儿子张恕带着奏章去了登闻鼓院,但奏章终究没能递上。

元丰八年二月,苏轼路过南都,登门拜见张方平。他在《书楞伽经后》里写道:“公时年七十九,幻灭都尽,惠光浑圆。”恩公看淡生死,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,“老于忧患,百念灰冷”。两人座谈,回顾往事,倍感前景黯淡。

正说着,张方平从屋里取出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四卷,还有三十万钱。张方平自知来日无多,开口说出夙愿,想刻印这部经,在江淮间流通。

明人释惠凯在《金山志》引苏轼跋中佚文:“此经在他人犹为稀世之瑞,况于公平?请家藏为子孙无穷之福。”有人认为,这话意味着苏轼一度想婉拒写经之托,许是顾虑时局,或因去处未定。不知张方平当时说了什么,最后苏轼还是接经、收钱,说请恩公放心。

这部经的分量,苏轼懂。时人相传,庆历年间,张方平守滁州,闲时进琅琊山僧舍,抬头看见梁间悬着一枚经函。拂开尘土,里面是一部《楞伽经》,只有半部。他提笔续写,写出来竟与原笔迹相合。此说极具传奇色彩。

二、金山写经

这部《楞伽经》全称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,是禅宗初祖达摩用来印心传法的宝典,亦为唯识学重要典籍。当时存刘宋、北魏、唐代三种汉译本,而刘宋四卷本最接近原始义理,流传也最广。

苏轼遵恩公张方平嘱托,手执经卷、金钱,义无反顾地一路向南。那时他的身份微妙,朝廷同意他居住常州,还有个知登州的新差在等着他。五月初六诏命已下,他直到六月才辗转接命。

七月,苏轼乘舟抵润州。佛印当时在金山,东坡先以书止之“不必出山”,佛印却渡水而来。佛印,饶州浮梁人,云门宗高僧,诗人。当年苏轼谪居黄州,佛印住庐山归宗寺,隔一条江,两人书信往来,谈禅论诗,成了挚友。

如今佛印转任金山,旧友重逢,还是以玩笑开场,然后苏轼将张方平授经的事说出来。佛印听完,只说一句:“印施有尽,若书而刻之则无尽。”印经送人,印完送完就完了;若苏轼书,再请名匠刻板上石,印施广播,能千百年流传。苏轼当下心动了,或在金山寺借一间静室,研墨铺纸,开始抄经的长时日课。

苏轼在黄州时得过眼疾,元丰八年三月,张方平门下一位眼医王彦若用金针为他拨翳,左眼才重见光明。他为此写过一首《赠眼医王彦若》:“金篦刮眼膜,价重百车渠。”眼疾初愈就接下这抄经营生,分明有点儿逞强。

苏轼自然很看重这份使命,他在《书楞伽经后》跋里说:“先佛所说,微妙第一,真实了义,故谓之佛语心品。”“细视笔墨,手迹宛然,悲喜太息。”看着恩公当年笔迹,又悲又喜,发出一声长叹。悲的是恩公年事已高,喜的是字还在眼前。

金山在江心,涨潮时水声撼窗,他就在那间屋里笔耕不辍,可见写得郑重。五万多字,按一天千字算,要抄一个多月。后世山志留了一条评语:“苏东坡为金山寺所写《楞伽经》,无一懈笔,每字必带笔一二圈,为东坡一生杰作。”所谓“带笔一二圈”,是学颜真卿的笔意,又揉进了自己的圆润。

写完经卷,他提笔在卷尾自署:“朝奉郎、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。”时间是元丰八年九月。这时候,他人还没到登州,职衔倒先用上了。

苏轼跋里记了刻版的事:“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,求善工刻之版,遂以为金山常住。”元即了元,是佛印法名。佛印派弟子晓机去杭州找好刻工,版刻成后退回金山寺保管。一本书,经由苏轼写,版在钱塘刻,于是有了“一本经、两座城”的因缘。

书刻版成之后,佛印寄给蒋之奇一部印本。蒋之奇,字颖叔,常州宜兴人,嘉祐二年与苏轼同科进士,两人是同年。元丰年间,他任江淮荆浙发运副使,治所在真州,与金山隔江相望。苏轼在真州时,两人时常往来,品茶、念旧,交情不浅。

收到佛印所寄印本,蒋之奇欣然作序。他先写:“之奇尝苦《楞伽经》难读,又难得善本。”接着讲张方平“前生书”的传奇,“恍然觉其前生之所书,笔画宛然”。

半年余,一部经把南都、金山、真州连成一线,张方平、佛印、苏轼、蒋之奇,一人一环,这件大事就做成了。

三、续刻传世

苏写本《楞伽经》,于北宋元丰八年(1085)初刻于镇江金山寺,元祐三年(1088)又重刻于福州等觉禅院。如今国内已见不到初刻原版踪迹,后人要读这部经,只能看翻刻本。

福州鼓山涌泉寺,为翻刻地之一。山志说该寺藏版极富,“为海内外所无者”,《楞伽经》版片据说是从苏轼写本的初拓翻刻,乃至“与金山本莫辨”。到了清康熙五年,住持道需重刻此经,翻出来的字却被学者认为“尽失苏字之真”。

可靠的传承,在福州东禅寺。《楞伽经》末刊记:“此经流布到福州,即元祐三年二月也。等觉禅院乃命工摹勒镂版,安之本院法宝毗卢大藏,愿此殊勋,与物同济。”福州重刻的底本,应当最接近金山原版,可视为苏轼写经风貌的标尺。

可惜福州本散佚,日本倒存了两部完整的。1929年,日本佛教学者小野玄妙在京都东寺校勘藏经时,从《崇宁万寿大藏》中,检出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四卷,正是宋苏写刻本。其行款字体与他经相异。卷末刊记,系元祐三年二月,福州东禅等觉院摹勒入藏。小野参照蒋之奇序、苏轼跋及笔意,定为东坡手书上板,览毕叹为“不能不说是一件破纪录的出类拔萃的副迹”。

日本东福寺本卷首蒋之奇序末,有小字记曰:“广东运使曾寺正舍。”学者推测,此人即曾噩,福州人,官至广东转运使,很可能是他把经书从福州带到广州,再由海路传入日本。日本东福寺开山鼻祖圆尔辨圆,南宋端平二年入宋,归国时带回经卷一千余卷,《楞伽经》或是其中之一。

日本学者吉井和夫1985年发表《苏东坡书写<楞伽经>考》,中国学者祁小春、陈锺生也合撰《日藏宋刊苏轼写刻本<楞伽阿跋多罗宝经>考述》论文,结论是:日本所藏均为元祐三年福州等觉院重刻,并非元丰金山原版。苏轼手书真迹已不存在,最接近原貌的就是这两部宋刊。祁、陈被允复制卷首、卷中和卷末共六帧图片,成为中日两国正式公开资料,迄今为

止所能见到的数量最多的、最清晰的图片。

祁、陈评价宋刊苏写本《楞伽经》在现存古籍中极罕见,古籍版刻史上学术与艺术价值非常高。

四、登州遗产

金山写经,钱塘刻版,人还没到登州,怎算“东坡知登州”之作?

且看落款:“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。”新近被任命为登州知州,总管登州军政,兼管劝农,还有骑都尉勋衔,获准借穿五品绯色官服。

苏轼这些官场头衔,一层层裹身。不像他习惯落款,只一个“东坡”,这回照录吏部告命,一字不省。

是记时?九月,存念于新旧仕履之交割期间。

是表示郑重?全衔抄录,笔笔不苟。刚从黄州泥淖里拔出脚来,把官衔写在佛经末尾,更像一种命运转折、仕宦伏起之标记。悲欣交集,尽在其中。

五月诏下,十月到任登州,写经刻版时间跨度,占据其行程。后来他在登州五日任职,共待了二十几天,留下“一诗二状”等功业,就策马进京履新职。

于苏轼而言,书刻《楞伽经》不是摆设。经言唯识无境,山河自心所现。他把官职签名留在佛经里,把善事功业做在江淮、登州,亦在路上。遵张方平嘱托倾尽心力,是他实实在在的报恩之举;愿公一辈子的心愿,在学生手上实现。如此笃诚,堪称古代士人尊师重道的典范。

古往今来,凡利他者,必会善己。回过头看,十月二十日接到进京诏,他是否会立城楼、望古寺,心头伏起因果之想?刻经是因,施舍也是因,他本就有施舍佛物的习惯。治平间,父丧除服,舍吴道子四菩萨版于成都大慈寺,惟简筑阁贮之。熙宁中,任通判杭州,以吴道子释迦像及禅月罗汉寄施金山怀琏,恐其不受,托辩才往请。

相传苏轼接受张方平授经之时,也顺手接过他的禅月罗汉十六轴,施给了徐州开元寺僧法明,时间恰好是五月初六任职前夕。这笔功德来得无形,却是恩公的用心厚赠。

当年六月,法明在徐州,又把苏轼黄州时的一通手简,刻了石:“开元大殿,非吾师学行,神人响应,安能便成。”末志:“元丰八年六月望,住持徐州开元寺东院传教赐紫沙门法明题。”此刻石在苏轼知登州期间完成,冥冥之中像一份加持。

如今的蓬莱阁上,碑刻挂墙卧地,恐无《楞伽经》的只字片语。好在宋刊元祐本还在,若能取其摹本,哪怕一片,放在阁内空间,让东坡的字回到他“报到”的地方,这片海也就算等到了故人。

波涛依旧,墨痕犹存。